

青年的“侨批”：寄向祖国也寄向未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怡蒙文并摄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生陈俊维是广东江门台山人，生在台山长在台山。在参观一场展览之前，他只隐约了解到，侨批是“银信”的另一个名字，由家书和钱银组成，是海外华侨寄给家人的问候和资助。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烽火侨批——从战火中的侨批看华侨赤子心、家国情”展览近日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并将陆续走进广州、江门等地巡展。

展览分为“山河破碎 觉醒之声”“血色家书 苦难见证”“国民职责 毁家纾难”“抗战到底 必胜信念”4个篇章，通过百余件珍贵侨批、历史照片与多媒体装置，串联起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的14年全景，再现了烽火中的小家大国。

十余岁到三十余岁的青年群体，从“家”的角度来看，他们常常背负着亲子、夫妻、兄弟姐妹等多种亲缘关系，在家中是承上启下的角色；从“国”的角度来看，青年又是最热热的、最渴望有所担当、有所贡献的群体。

抗战时期侨批中记录的青年，是一个充满苦难、热血与担当的群体。他们的书信，既是家国情怀的真实记录，也是个人命运在时代洪流中挣扎与奋进的生动写照。

奔向亲人，他们寄出激愤的心

当观众参观展览时，会发现无论是青年还是中老年人，都会在信中诉说对日军的痛恨。“抗战胜利”“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等，是出现频率极高的共同话语，两代人都表现出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

但青年的情绪表达往往更强烈、更直抒胸臆。展陈大纲编写员、五邑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表示，青年在侨批中的浓烈情感，是愤慨、忧虑与信念的复杂交织。

青年廷香给母亲李氏的信中写道：“我最亲爱的妈妈：我曾痛恨日本的军阀，现在我更痛恨他们到刺骨了，我们目前所受的痛苦，所发生的纠纷，不是日本人给我们的吗？倘若他们不来侵害我们的领土……”

姚 明

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战史诗中，文学以其独特的力量铭刻着历史的深度与灵魂的温度。徐光耀创作的《小兵张嘎》，正是这样一部从战火硝烟中诞生、并持续滋养数代读者心灵的文学丰碑。

作为曾亲身战斗在晋察冀抗日战场的老八路，徐光耀的创作源于那段血写的历史。作品以鲜活生动的儿童视角和极具泥土气息的革命叙事，自1961年在《河北文学》首发后，经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机构广泛传播，成为经典抗战文学。

带着泥土气息与生活毛边的真实性

徐光耀是八路军120师359旅的一名战士，“小兵张嘎”的身上，活跃着诸多当年冀中白洋淀地区小八路的影子。这种从战地硝烟里提炼出的创作资源，赋予小说无与伦比的纪实性与真实感。

小说中，嘎子对那象征反抗与力量的“真枪”的执念、目睹奶奶牺牲和老钟叔被捕后内心激发的刻骨仇恨、在革命熔炉中快速成长的历程，都是千千万万在战争中失去童年却迅速肩负起保家卫国重担的中国少年之缩影。老钟叔、奶奶以及众多乡

张景平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的长安，仍裹挟着安史之乱后的凛冽余寒。46岁的杜甫，在饱经颠沛之后终于获得左拾遗的官职。这个隶属门下省的从八品上官职如暗夜微光，照亮了他半生颠沛的仕途。左拾遗主要的职掌在于劝谏君主，对各种决策查缺补漏，可直陈君前——这恰是他“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在乱世中仅存的希冀。

杜甫出身京兆杜氏，在唐代是数一数二的高门，却不屑借门荫捷径入仕，执着于科举正途，又深陷李林甫专权时的科场阴霾。这份乱世中的谏官之职，既是时代对其忠君之心的回应，亦承载着盛唐余晖里的挣扎。干谒权贵的窘迫、友人仕途顺遂的落差，皆使他将这小小官职，视作千斤之托。这一时期，杜甫的创作可称旺盛，但一首《春宿左省》则最能道出几许别样的心声：

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这首诗是杜甫在“宿直”时的作品。文官宿直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宿直，又称直宿，即官员于夜间值守官舍，其含义与今日部分公务员的“值班”大抵相当，其渊源可追溯至先秦。

《诗经·召南·小星》有“肃肃宵征，夙夜在公”与“抱衾与裯”之句，郑玄注：“裯为床



展览现场

青年对日军的暴行表达了最直接的愤怒和痛恨。他们对其用“日贼”“倭奴”等词汇，充满了义愤。这种情绪源于对家乡和同胞遭受苦难的切肤之痛。

因此，对家人安危的深切忧虑也是侨批中最普遍的情绪。他们无法亲身参战，只能在信中一遍遍叮嘱家人如何避难。如台山籍澳大利亚侨民源详详细叮嘱女儿：“汝有时或获海圻不可由公路而去，恐有贼国飞机沿公路经过，见机上机关枪扫射，贼军之野心不谓人道。”

尽管战局艰难，但许多青年在信中表达了“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坚定信念。

在美国的林栢宇在信中鼓励儿子：“但系取于时势……日本定还我河山，抗战胜利。”同样在美的陈钦振在给妹妹的信中也展望：“我在处(我所在的地方——记者注)每日所看至西人报纸及唐人报，论及我的中华民族抗战，得宜最后胜利……吾也望中国最后胜利，得到一个世界上大强国，是我中国。此是大希望也！”

跨过海洋，他们送去共筑的力

刘进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侨批中



展览上的留言墙



展览现场

比起中老年人的信札中更多出现对于家庭宗族具体事务的安排(如款项的分配、家庭生活的长远规划)，青年的目光更关注宏观战局和国家未来。他们常在信中讨论战况进展、国际形势，如“俄国牵制出兵”“英美借款”，并畅想战后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愿景。

与长辈的信中传统的“光宗耀祖”“读书上进”等观念相比，华侨青年一代对个人与国家的现代化前途有更强烈的意识。一位父亲给自己的子女廷芳的信中写道：“须知和平时期非有学识及技能者不能立足。”

在海外的青年，强调学习新知、掌握技能，以适应现代世界。战后，青年金福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后起之青年个个都抱着雄心万丈去求高深学识和技能，以应将来为国为家做个不平凡之人。看此世界，假如无些学识是不能立足。”

跨越海洋，他们送去共筑的力

刘进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侨批中

《小兵张嘎》：淀上硝烟中的真实少年



《小兵张嘎》版本，河北文学馆存。作者供图

亲的形象，集中概括了许多同类英雄和普通人的结果，共同构成了一幅坚实可信、带着白洋淀水土气息的全民抗战图景。

在艺术表达上，徐光耀避免了英雄人物的概念化拔高，转而追求一种带着泥土气息与生活毛边的真实性。嘎子性格中那股浓浓的“嘎”劲，任性、顽劣甚至带着些“小狡猾”的一面，恰恰是其作为战争环境下北乡村少年真实生命状态的艺术还原。

徐光耀通过细腻刻画嘎子为争夺木枪而赌气、在亲人蒙难后强忍悲痛迅速成

熟，最终将刻骨家仇升华为自觉卫国责任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一个稚嫩生命在极端重压下迸发出的惊人韧性之转变。

这种转变过程基于严密的战时生活逻辑，作品将宏大历史叙事沉降到一个普通少年的情感轨迹与精神成长上，让民族抗争史获得了个体生命的体温与质感。这也证明了伟大的抗战文学必然深植于历史的真实现场与人民的真实光辉之中。

版本修订与抗战记忆的塑造

《小兵张嘎》自诞生以来，其出版传播史构成了观察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讲述、阐释与传承抗战记忆的重要窗口。

一条清晰的版本链条贯穿其间：1961年在《河北文学》首发，1962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小兵张嘎》单行本；同年《小兵张嘎》的电影文学剧本也发表在《电影创作》上，后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1963年12月上海人

烙印在数代青少年的文化记忆之中

《小兵张嘎》之所以能历久弥新，核

当杜甫值夜班

“省”的机关，其主要长官都是从汉代那些办公地点处于“禁中”亦即“省中”的近侍之官发展而来。“省”与“禁”的关系从简单的避讳替代变成了皇宫与官署的区隔。因此，“省”成为隋唐时代主要官署的名称不是偶然的，其背后隐含的是权力结构变化的丰富信息。

隋唐长安城于汉代京城之不同，在于专设皇城集中布置中央官署，并与北边的宫城相区别。尚书省、诸寺监、诸卫都位于皇城中，但地位重要的中书、门下二省仍处于宫城之中。高宗朝以后，长安的政治中心转向更北面的大明宫，中书、门下二省亦随之移于其中，“到皇帝家值夜班”就成为一众“供奉官”不得不承担的任务。

唐代宿直官中书，故有《和张舍人夜直中书、寄吏部刘员外》之作，此最为典型。

从办公地点上来看，汉代中央官署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三公”及其属官僚佐为代表，他们的办公地点散布在京城各处；另一类就是九卿中为皇帝私人服务的部门以及卫队，他们的办公地点就在宫中或在宫殿附近，其中的尚书、黄门等后来演变成外朝高官。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后世称为

我们不妨看看元稹的一首作品：天门曙玉珥，昼送中樞晓禁清。彤管内人书细，金食御印象分明。冲街不避将军令，跋敕兼题宰相名。南省郎官待待诏，与君将向世间行。

元稹似乎非常认真地构建着一个居于天上的禁中。与元稹这样的后辈相比，杜甫的宿直作品要温柔敦厚很多。文章开篇所引的《春宿左省》，清人仇兆鳌谓其“自暮至夜，自夜至朝，叙述详明，而忠勤为国之心，即在其中”，代表了后人对此诗的通常评价。

心怀“报效”之心又有“忠爱”之情的杜甫，好不容易才有这样一个接近皇帝的机会，因此念兹在兹、倍加珍惜。“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文章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这是其宿直期间心情的真实写照。能够在“禁中”这样靠近皇帝的地方宿直，当然是一种荣耀；只是，杜甫皇帝的物理距离虽然很近，但政治意义上其实很远。

杜甫晚年的一首《宿昔》这样写道：宿昔青门里，蓬莱仗数移。花娇迎杂树，龙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宫中行乐秘，少有外人知。

人们更直观地认识到战争对家庭和社会的破坏，从而更加珍爱与和平。

“近年来，多家单位开展侨批活化工作，推出了诵读剧等文艺作品，文创产品的研发也在积极推进。江门市博物馆积极参与其中，提供文物素材和专业支持。”高江辉说，“博物馆愿意与有好创意、好方案的各方合作，通过更生动的形式展现侨批的文化内涵。”

这次展览，江门外出青年发展促进联盟邀请了一批在京江门籍学子观展。陈俊维就是这样受邀前来的。“观展前，我知道侨批承载着深厚的亲情；观展后，我了解到在亲情之外，从抵制日货、支持国货到捐资回国、航空救国，侨批还承载着更深沉的爱国情怀。”

中国传媒大学的江门籍学生张子瑶说，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那封美国华侨邱光绍写给母亲温氏的信。“信中写到处处的钱款、写对对家庭的关心、写对时局的担忧，唯独不提自己在海外的委屈与挣扎。”

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的林德骏出生在江门蓬江，世代居于此。他的父亲小时候就在江门潭头林村生活，村里有过华侨，亲友里也有远嫁给华侨的。“抗战时期，我们林氏家人，有的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逃到港澳地区，有的在家乡面临食物等资源短缺的困境，还好有海外华侨的资助，他们向家乡捐物资送粮食，为维持乡亲的生活作出了很大贡献。”林德骏说。

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航空救国部分。他在展览中了解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些华侨青年回国参加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也影响了他们战后的人生选择和下一代的教育。

抗战时期与国内交流，让一些华侨青年对国内的新生命力与发展趋势有了新的认识。

原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张侨批文物图片显示，1938年，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和驻粤办事处代表潘汉年、廖承志，向澄海旅泰青年侨领苏君谦和他的同乡挚友郭子纲、黄奕三人回信，感谢其捐款国币200元支持抗大培养抗战人才的爱国义举。1940年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访问延安后，也有越来越多华侨青年选择了靠近、了解延安和共产党。

穿越时空，我们读到真挚的爱

展览承办单位、江门市博物馆馆长高江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侨批中的私人书信能真实、细致地反映华侨在抗战等重大历史时期的心境，展现出他们的爱国情感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最真实的情感表露。侨批中记述了战争造成的具体灾难、个人生存困境及家人伤亡等真实案例，让

“之前在历史书上学到的都是‘华侨捐款支持抗战’这样的宏观描述，现在看到这样具体的人和事，才得知航空抗战救国方面也有华侨华人的力量。”林德骏说，“往后我在求学定会奋发向上，像先辈们那样，把对家乡、对祖国的这份情，变成实实在在的担当，为家乡江门、为祖国尽一份青春力量。”

江门市博物馆的青年讲解员黄炳宏，在此次展览中承担了十余场讲解。展览现场设置了听筒装置和老式信纸信封样式的留言墙，有许多观众体验互动，给他留下了印象。

“听筒让观众从视觉转到听觉，增加了互动，观众十分喜欢这种方式，还希望有多种语言的选择。”黄炳宏回忆，“有一名大学生，在参观完后留言，‘强吾中华在于我青年’。这让我感受到梁启超‘中国少年’与‘少年中国’的精神，仍在激励着一代代年轻人。”

心在于它已超越儿童文学的藩篱。徐光耀怀着“不把这血写的历史写出来，就对不起那些牺牲的人”的崇高使命感，将其作为文学存史的庄重实践。

正是这种内在的精神硬度与历史价值，使得《小兵张嘎》迅速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长期作为中小学语文教材节选课文及重要课外阅读书目。小说中那些精彩纷呈、寓教于乐的情节，如嘎子堵烟窑惩治敌人、巧设妙计活捉奸奸翻译官、火烧敌炮楼展现无畏勇气，以及其背后凝练的机智灵活、勇敢无畏、百折不挠的少年抗战精神，深深烙印在数代青少年的文化记忆之中。

1963年同名电影的公映，“张嘎”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此后数十年间，根据小说改编的连环画册、舞台剧、广播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层出不穷，构成了一场持续的文化传播接力。各种改编作品在忠实于小说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因应各媒介特性和时代审美需求作出合理调适，确保了“小兵张嘎”这一形象的生命力与感召力经久不衰。

嘎子的形象，早已不是孤立的文学人物，而是特定历史空间下，千万中华少年抗战报国的集体象征。更为重要的是，《小兵张嘎》通过进入教育体系并与大众文化传播网络，确保了由无数英烈用生命和鲜血写就的抗战精神，得以薪火相传，融入民族的文化血脉。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

主，不能留有瑕疵，并要全面“净化”自己的回忆。

“三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这里的“朝班”在沧江日暮的烘托下，越发显出神圣庄严的气象，似乎唱名的声音在一片肃静中可以耳闻。但杜甫在《狂歌行》中的自白应该更接近事实：“长安秋雨十日泥，我独骑驴听晨鸡。公卿朱门未开锁，我曹已到肩相齐。”

杜甫虽然在精神上可以保持与君主的联系，但在真正离开官阙后，还是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存在物来维系、提醒自己，各种“赐物”是其中尤为珍贵的东西。请看下面的两首绝句：“忆过泸戎摘荔枝，青峰隐映石逶迤。京中旧见无颜色，红颗犹疑只自知。”“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

蜀中的荔枝，在杜甫看来不是简单的水果，而是寄托了他对玄宗难以割舍的感情。由此可见，老杜之所以将君臣引入日常生活，首先在于有实际层面的君臣关系体验；其次，则是将其进行了提纯。他的天才与努力，使得“君臣之思”与“君臣意象”可以在后代更多的普通人那里成为美感与正义感的来源。

因此，我们就大致可以明白杜甫后期的“君臣之思”为何日益强烈。杜甫更愿意保留并升华为左拾遗时期的那种崇高感，正如他在《春宿左省》之中描述的那样，但要祛除其中的不适感与屈辱感；他要在诗歌中以一种令自己满意的态度去面对君

(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